

SHISHEN RENMIANLU

狮身人面录

郑秉谦

学林出版社

DZ85/11

狮身人面录

——对史传文学的艺术剖析

郑秉谦著

一九八九年·上海

1184859

特约编辑：郑成义

封面设计：陈明钊

狮身人面景

——对史传文学的艺术剖析 郑秉谦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杭州西泠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8.75 插页3 字数205,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0-306-2/I·101

定价 3.60元

目 录

1. 钜鹿之野与“士别三日”……………（1）
——一个被忽视的宝库
2.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6）
——塑造历史人物形象要从活生生的人出发
3. 走棋压倒了死亡，也压倒了胜利……………（12）
——史传文学的历史真实性
4. 大丈夫与老嫗，都同样爱小儿子……………（16）
——史传文学的传奇性与写实性
5. “槐下之言，谁人闻之？”……………（21）
——在不自由中争取自由
6.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24）
——历史素材的选取与删汰
7.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30）
——史传文学必须表现历史必然趋势
8. 太史公怎样“深入生活”……………（33）
——作者阅历对史传文学创作的作用
9. 董狐，古之良史也……………（38）
——作者世界观对史传文学创作的作用

* * *

10. 以一当十，持一当百……………（ 42 ）
——文学创作的典型化问题
11. 并非选美活动……………（ 47 ）
——“状物”为了“抒情”
12. 要舌头，不要完整的尸体……………（ 51 ）
——典型人物和时代性的问题
13. 三个坚持已见的人……………（ 55 ）
——典型人物是“熟悉的陌生人”
14. 老大断送老二的性命……………（ 59 ）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
15. 不能“大书一行足矣”……………（ 63 ）
——细节描写
16. 三种坚持原则的方式……………（ 67 ）
——形象思维在典型化中的作用
17. 梅兰芳的对联……………（ 71 ）
——形象的单纯性

* * *

18. 惊弓之鸟与惊鸟之弓……………（ 76 ）
——素材·题材·主题·形象
19. 下旨征求“微时故剑”……………（ 81 ）
——题材的暂时性与形象的永久性
20. 创业难还是守成难？……………（ 85 ）
——主题的独创性·丰富性·多样性
21. 不问苍生问鬼神……………（ 89 ）
——思想倾向要从作品中自然流露
22. 虽欲为姊久煮粥，其可得乎？……………（ 93 ）
——感情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

* * *

23. “服其雅量”与“宠辱不惊”……………(97)
——在冲突中显示人物性格
24. 皇帝自作《起居注》……………(101)
——在对比中显示人物性格
25. 皇帝怎样考察将军……………(108)
——“以小见大”显示人物性格
26. “皮里春秋”不同凡响……………(112)
——含蓄手法在塑造人物中的作用
27. “烘云托月”与“因柳见风”……………(118)
——间接描写的作用
28. “文圣”孔丘与“武圣”关羽……………(123)
——塑造人物形象首要在传神
29. 皇帝大笑·御史督工·将军做梦……………(128)
——传神的渠道与方法
30. 三个皇帝的投降……………(132)
——白描手法
31. 莲花似六郎与千金买马骨……………(137)
——“奇”在人物塑造中的重要性
32. 浮夸的祖宗与荒诞的大王……………(141)
——“奇”来自对尖端事物的选取
33. 吕蒙正与唐太宗……………(146)
——“奇”又来自某些一般事物的集中
34. 采桑女与吕太后……………(152)
——“奇”还来自对生活中偶然性的运用
35. 弯弓、提鼓而见客……………(156)
——“变形”手法的运用
36. 魏征的妩媚与安禄山的老实……………(161)
——“破格”手法的运用

37. 游仙式的送礼与蠢猪式的打仗…………… (168)
——人物性格的基调及其复杂性
38. “杀人佳贼”与“文学天子”…………… (174)
——人物性格的变、常关系
39. 两脚狐·殿上虎·大树将军…………… (180)
——人物绰号的力量

* * *

40. 仅仅两百字的“军事文学”…………… (184)
——结构的妙用及结构的根据
41. 楚霸王与范蠡，谁是“万人敌”…………… (188)
——叙事的均衡美与曲折美
42. 一张白纸顶一千匹绢帛…………… (193)
——叙事的节奏美
43. “鸿门宴”的教训…………… (198)
——要善于说故事
44. 踏花归去马蹄香·蛙声十里出山泉…………… (202)
——转换形象的叙事手法
45. 冒顿的突然袭击…………… (207)
——蓄势·铺垫·悬念

* * *

46. “新亭对泣”和“坏我长城”…………… (213)
——文学语言的根本特征
47. 刘项对始皇车驾的不同评论…………… (217)
——文学语言的准确性·简练性
48. 将军责问皇帝：你为啥造反…………… (221)
——对话的个性化
49. 在德不在鼎与在德不在险…………… (224)
——对话的说理性·哲理性

50.	将军翻饼和大臣炒栗	(230)
	——对话的具体性·形象性	
51.	论证白马非马与奴婢三耳的哲学家	(237)
	——对话的句法·语气·辞令	
52.	“海大鱼”和“笔头奴”	(244)
	——对话的气氛	
53.	“令鹤击翟”与“象齿焚身”	(250)
	——语言的容量与表现力	
	* * *	
54.	两个宰相的“临终嘱咐”	(256)
	——想象在欣赏中的作用	
55.	治罪消灭不了美	(262)
	——美的多样性	
56.	“两不象”还是“四不象”	(270)
	——释本书的书名	
后 记		(273)

钜鹿之野与“土别三日”

—— 一个被忽视的宝库

白发苍苍的老会计师告诉新上任的年轻厂长：“我们还有一笔未曾使用的资金。”锐意改革的厂长会调动它来更新设备，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厂。

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李四光告诉全国人民：“按照我的‘构造体系’这一地质力学的基本概念，在我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带，应有沉睡的石油宝库。”于是我们找到了大庆、胜利、大港……以至东海的龙泉油田。

文学史家不断提醒我们：在我国古典文学领域里，也有一个被遗忘、至少是被忽视的宝库。我们应该怎样办？

这个被忽视的宝库，就是我国的史传文学。我国历来文史并称，在汗牛充栋的正史、野史中，有不少既是历史著述，又是文学作品；既铺叙史实，又描绘人物。我国古典文学中的抒情作品，当然发端于古逸诗、《诗经》、《楚辞》；叙事作品呢，则并非从唐传奇、宋话本才开始，而是发轫于史传文学。

《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就是

它们辉煌的代表。

我国历代文人，都重视史传的文学性。以《左传》说，晋朝贺循曾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唐代刘知几则说它，“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以《国语》说，陶望龄曾分卷加以评论，对其中的《越语》称：“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二十四史中的《史记》，称赞的人更多，鲁迅先生甚至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他如《汉书》等，也具有浓厚的文学性，苏东坡就有“读汉书以下酒”的说法。宋代司马光等编的编年通史《资治通鉴》，叙述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一千三百余年史事，取材除十七史外，还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二百二十二种，并大体保留了原文的文学性。清代毕沅等编的《续资治通鉴》，上与《资治通鉴》衔接，下至公元1368年，记宋辽金元四朝四百余年史事，其中北宋等部分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对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这个宝库，我自青年时代即很向往，虽想涉猎，但当时戎马倥偬，读生活这本大书还来不及，哪能再去啃这批古书呢？但衷心藏之，何日忘之。一九五七年，正当我乘社会主义革命之风在文学的大海扬帆前进时，由于大家所知道的原因，突然帆崩桅折。此后二十年间，我虽无法发表作品，但一直未忘情于文学创作事业。《资治通鉴·汉文帝前十四年》曾载文帝向老臣冯唐讲的一段话：

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

刘恒是说他在当代王时，他的“尚食监”高祛，每当他吃饭时

就给他讲过去赵将李齐之贤，及其在钜鹿一带的战斗故事。因此，他直到成了皇帝后，每次吃饭总还要想起钜鹿来。这段故事中的“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一语，正好说明我当年的心情。当时我一方面顶着批判与讥笑，继续写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的长篇《碧海缘》等的初稿即此时所写）；另一方面，则发疯也似地偷偷读书，其中也包括上面提到过的一些史书。

我读，一是为了审美，欣赏史传文学著作中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二是为了学艺，从史传文学著作中学习写作方法与技巧，以便于自己能更好地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我相信我总有一天能重新驰骋于钜鹿之野。我的希望没有落空，二十年后我重新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于是我在创作的同时，又将当年的学艺心得陆续写出，以《宝海初探骊龙珠》为总题，在大型文学刊物《春风》、《长城》、《柳泉》、《莽原》、《绿原》、《长江》、《百花洲》、《创作》，以及《安徽文学》、《随笔》等上面发表，总字数达七万字左右。这些文章，专门研究史传文学著作状人叙事、模情写态的方法与技巧，而不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史料的真伪。

刊出之后，我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敦促我继续写下去；也得到创作界的一些朋友鼓励，说这对他们写小说不无参考价值。其中有一位还提醒我：既然公开发表了，那就应不仅给从事文学创作的同行看，更应适合一般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的阅读；不仅要谈学艺心得，也应谈审美感受。这话对我很有启发，加之我又在赶写新的长篇，于是暂时中断《宝海初探骊龙珠》的写作，准备以后重写。

我常这样想，文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当然要涉猎外国的文艺珍藏，但同时更不能忽视自己的宝库，不管是其中的哪一座。在我们击节赞赏荷马史诗时，更应津津乐道《左传》、《史记》。这正如在我们向往金字塔时不能忘记万里长

城一样。齐奥普斯金字塔所代表的文明，固然值得我们赞叹：它的所在地就是地球重心所在，它的高乘以十亿就是地日距离，它的塔基面积除以塔高的二倍就是圆周率。在我们钦佩古埃及人的同时，我们别忘了宇航员们却在赞赏我们的祖先。他们说：“从宇宙空间看地球，唯一能见的人工建筑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否可允许我这样说呢：《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二十四史和大量野史，是我国史传文学的万里长城。我希望我的这本小书，能成为一册“长城导游”。

当然，我丝毫也没有改变我的初衷，我更想使这本小书成为文学理论、写作方法的形象化的参考书。我希望读者能从我国灿若群星的史传文学著作中，学到一点文学基础知识与写人叙事的技巧。

但不论从审美还是从学艺两方面说，读者如在读了我这本小书后，产生涉猎史传原书的兴趣，则就是我所最希望的了。

《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五年》曾谈到吕蒙读书的故事：

初，权谓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

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卿言多务，孰若孤？

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得益。”蒙乃始就学。

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议论，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孙权过去曾向他的部下吕蒙说：“你当了大将，不可不学。”吕蒙说没空，孙权说：“你忙还是我忙？我都常读书，以为开卷有益。”吕蒙这才开始学习。后来鲁肃见了他，互相谈话，大惊道：“你的才略已非‘吴下阿蒙’可比了！”吕蒙答道：“本来嘛，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老兄怎么才发现呢？”孙权对吕蒙的评价很高，说他“及身长大，学问益开，筹略奇

至，可以次于公瑾（周瑜）”，而居鲁肃之上。吕蒙后来代替鲁肃为帅，袭破关羽的精锐部队，收回了荆州。吕蒙的故事，说明人一定要多读书。吕蒙所读何书，史无明文；但我想一定包括史传在内。当然，他是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研究史传的，而我们是作为普通读者或作家来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阅读原著却同样是必要的。而也只有这样，才能“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塑造历史人物形象要从活生生的人出发

真实地写好一个英雄，不容易。真实地写好一个做了开国皇帝的英雄，更不容易。而封建时代的史官，要真实地写好本朝的开国皇帝，神王圣武，尤其不容易。但司马迁写刘邦，却“轻而易举”（不如说“举重若轻”）地完成了任务。

司马迁（约前145—？）是西汉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早年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后来继父职当了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他在公元前104年到前91年，撰成了《太史公书》，后来通称《史记》。成书时，离刘邦去世不过九十年左右。当时刘邦的子孙还在做着皇帝，刘邦被谥为高祖，享受着“最最最”高级的礼遇。司马迁要写刘邦，在这种情况下，有三种方法可供选择：

一是从抽象的道德品质与才智能力出发，把他写成“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写法，中国历代史书中有的是。在中国古典文论中，也有不少认为写“神王圣武”就该如此。譬如假托金圣叹之名评点《三国志演义》的毛宗岗，就说三国的人物只有

两类：一类是典型，如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具有忠、智、雅的特点；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具有节、义、忠、勇的特点；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具有“似乎”忠、顺、宽、义诸特点。另一类则是只体现某种品德才能的人物，如徐庶、庞统之运筹帷幄，周瑜、司马懿之用兵设谋。据此，则也可把刘邦塑造成仅具有哪几种抽象的道德品质的“古今来开国圣君中第一奇人”了。

二是从具体的根据与条件出发，写出刘邦的活动与心理现象。这比前一种办法已是一个进步，如被毛宗岗冒充过的金圣叹本人，在他的评点中就是提倡“因缘生法”、意即“根据”加上“条件”便产生“现象”。但用这个方法写成的刘邦，可能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缺乏活生生的个性。

三是从生活中的“这一个”、从活生生的刘邦出发，从他本人的情理（内心活动、性格）和社会关系的情理出发。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就认为写小说，“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两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得传矣”。司马迁不是写小说，但他同样是做文章，他便是从刘邦的活生生“情理”出发来塑造刘邦这个典型人物的。

刘邦（前256—前195），是西汉王朝的建立者。早年是个无赖，当过泗水亭长。陈涉起义，他出兵响应，后与项羽同为反秦主力。他攻占秦都咸阳后，又与项羽展开长达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最后统一了天下。建国后的措施，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司马迁从活生生的刘邦的“情理”出发，不仅写了他政治上的雄才大略；而且以极大的胆识，写了他品德上的无赖习气，感情上的强烈英雄色彩，写出了“这一个”的典型特征。

刘邦打进咸阳后，就召集各地父老、豪杰宣布：“你们受秦朝苛政之害已久，诽谤的灭族，偶然失言的死刑。现在我同

你们约法三章：杀人的抵命，伤人及盗窃的抵罪。其余苛法，一律废除。”并且立刻离开秦朝宫室，把部队拉到城外。秦人大喜，争着用牛羊酒食劳军。刘邦又不受，说：“有仓粟供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大家更高兴了，唯恐他不在秦称王。人心思汉，这就为他平定天下打了结实基础。但这些英明的政治措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刘邦“这一个”人的情理产生的：

刘邦自少“好酒及色”，没钱，常赊酒喝。当他带役徒至咸阳，见秦始皇车驾，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曾指出这句话格调低、庸俗，“津津然不胜其歆羡”，认为它就不如项羽说的“彼可取而代之”和陈胜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鸣盛的看法是对的，言为心声，这样的话必定出自刘邦这样的人物之口。因此，他在打进咸阳后，初见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后来经部下再三谏止，才撤军城郊。当他统一天下后，在未央宫大宴群臣，为他父亲祝酒时还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他是在说：“你大人过去常说我无赖，不事生产，不及老二。现在你看我所挣的家业同老二比，谁多？”王鸣盛曾抨击这段话，说：“其言之鄙至此！”但这就是刘邦，只有这样才反映了他的“情理”。由此也可看出，他的“秋毫无犯进咸阳”不是天下掉下来的，而是他在群臣帮助下自我斗争的结果。

刘邦曾在洛阳设宴，问列侯诸将：“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群臣回答了，但他不满意，却自己说了一段水平很高的话：

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餉，不绝粮道，吾不如肖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认为群臣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应军饷，我不如肖何；用兵攻战，我不如韩信。这三个都是人杰，我能用他们，所以我得了天下。项羽有个人杰范增却不能用，所以他为我所灭。这段话，在五十年代“左”的倾向抬头时，曾被用来证明“外行必须领导内行”。但其实刘邦只是指出人才难得易失，得才即得天下、失才即失天下的规律而已。而这个规律，刘邦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只是他“这一个”人在他的正面与反面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仍然充满了刘邦的个人色彩。

他曾从他那“慢而侮人”的情理出发，没有重用韩信。及见肖何追韩信，他就骂肖何道：诸将一逃十数，你不追，独追韩信，这是假的，你其实是自己想逃。肖何答道：“诸将易得耳。至于信者，国士无双！”这才引起他的重视，登坛拜将。但同时他又心怀妬嫉，时时预防韩信势力强大，尾大不掉，经常将韩信部下精锐调走；全歼项羽后，又夺取韩信的兵权。韩信的终遭杀害，乃是从刘邦和他关系的“情理”所引出的必然结果。杀韩信的当时，刘邦并不在，是由肖何为吕后设计，骗韩信入未央宫，缚之处死。因此古谚说：“成也肖何，败也肖何”；但这只是现象，从本质看，应说是：“成也刘邦，败也刘邦”。并且，即使肖何自己，尽管功最高、言行最谨慎，但也素遭刘邦之忌。只是由于肖何识时务，屡次刷清自己，刘邦才